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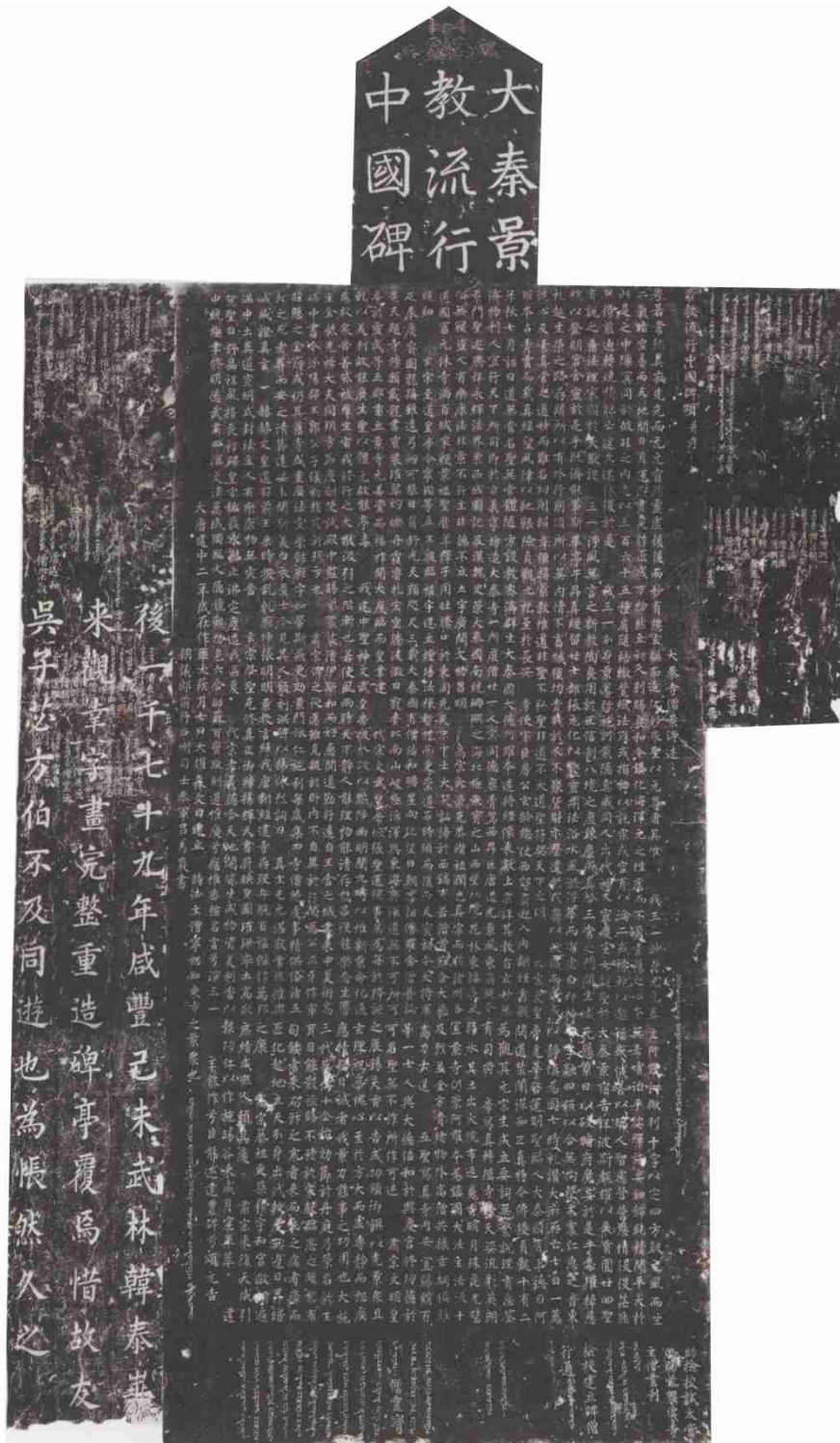


图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建中二年（781）僧景净撰 吕秀岩书并题额 清拓本 国家图书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述景教在唐代的流传情况的重要文献。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由一个名叫景净的波斯传教士撰刻树立，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

高 279 厘米，宽 99 厘米，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 1780 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碑额上部，由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自西域、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

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的出土向世人披露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第一章；对该碑的研究，标志着中国景教研究的开始。

随着景教的没落，大秦寺的院落为佛教所用，此碑不知何时失落。明天启三年（1623）出土，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得知后，争相传拓，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20 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荷尔姆（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荷尔姆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获准复制一通带回伦敦。荷尔姆的复制品，十分逼真，几可乱真。回伦敦后又依照原碑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1907 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

另外，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等地还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及叙利亚文景教经典残卷，景教碑的叙利亚文题记与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文景教经典用的是同一种教会语言。

参考文献：

阳玛诺《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论》，清乾隆十九年（1754）京都南堂刻本。

王昶《金石萃编》，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

E. A. W. Budge, *The Monks of K. bi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928.

P.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Kyoto and Paris, 1996. 冯承钧译《景教碑中叙利亚文之长安洛阳》，《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东京：大空社，1996。

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434—472页。

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